

争是世界大战,如上所说,新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上述各类战争包括第三类战争,虽然凶猛、惨烈,但不会扩大成世界大战。

3、分化重组。由于世界力量失衡,在达到新的相对平衡之前,世界就战乱不止,不得安宁,这正如一碗水如果不端平,就必然动荡不止一样。而在这种动荡之中,各种力量必然会不断发生分化组合。这里首先引人关注的是大国力量的分化组合。这种分化组合的特点,一是超级大国占举足轻重的主导地位;二是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价值观等各个方面;三是一般不搞结盟。这种分化组合,在近年来表现得特别明显。如俄罗斯在与美国、欧盟、北约和中国之间,正小心翼翼地、艰难地寻找自己的方位。欧盟正在致力于政治一体化和建立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并在对它与美国、俄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日本则不断寻求与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建立它认为最适当的关系。此外,如印度、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以及东盟、拉美、南方共同体、非洲联盟等国家集团也都在参与到世界力量不断分化组合的游戏中来,这种分化重组将不断进行下去,成为当今时代的一个特点。

4、合作斗争。在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的情况下,世界各国和国家集团在不断进行分化组合,意味着它们之间既有合作,又有斗争。这种状况过去历史时期也都存在过,当前时代的特点在于,合作和斗争都是全方位的,遍及各方面、各领域。在合作中有斗争,在斗争中又有合作。另一特点是,当今国际合作一般不致导致结盟,斗争又一般不会导致安全关系破裂。再有一个特点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强的当代条件下,发展国际经济合作成了普遍的要求,经济合作对国际关系的缓和,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5、曲折前进。人类社会总是要前进的。当今时代,虽然比起冷战时代矛盾更为复杂,斗争也更为普遍化,遍及全球各个领域,动荡、危机和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随时可以发生,但从长远的大趋势看,超级大国的实力地位,将在其称霸世界的努力中,相对下降;其他大国和国家集团的力量将有不同程度的加强,更多的国家将从不发达变为中等发达,世界人民的力量将更加壮大,世界和平将有望成为永久的现实,世界经济将有巨大发展,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融合将更紧密,各民族、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和渗透将更加加强。预计这个前景,将在21世纪中叶成为现实。○

## 略论当前世界的政治特征

王缉思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所长 研究员)

在我们的政治词汇中,“时代”是一个宽泛、抽象而且容易引起争论的概念。本人力有未逮,不敢给当今的“时代”下任何定义,仅能就世纪之交的三五年里世界政治形势发生的变化,从特征入手,发表几点粗浅的看法。

第一,和平——但不够公正。

冷战刚刚结束时,有人预言将出现一个“春秋战国时代”。然而事实证明,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列强争霸,已经不在我们的前瞻视线以内。局部冲突引发大国对抗的可能性可以基本排除。但是,这种“总体和平”的局面,也许可以视为“霸权治下的和平”,以

区别于多极化或大国均衡势维系着的和平。

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是美国同其他大国力量对比失衡状态下的和平。应当看到,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要维系这种和平和稳定,而不是破坏现存的国际秩序。西方国家要不遗余力地保护生命攸关的中东石油通道,防止非洲的种族仇杀造成更大规模的难民灾难,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在朝鲜半岛、巴尔干半岛,美国今天都在努力维持和平局面,有时积极调停,有时甚至诉诸战争,以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

就像战争可以区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一

样,和平也有公正的和平和不公正的和平。由霸权维系的和平和稳定,在很多情况下是牺牲公平与公正的。它剥夺了一些国家和社会集团使用武力反抗霸权、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而美国却独家垄断着大规模使用暴力的权利,以各种理由发动像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这样“一边倒”的战争。美国企图剥夺中国使用武力遏制“台独”的权利和能力,是霸权稳定造成不公正的又一个例子。

各强国对美国不公正的单边主义强权外交都十分不满。但在国际战略力量失衡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国家出于实际考虑,不是采取联合抗美的“合纵”之策,而每每与美国“连衡”。尤其是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由于同美国相互依存程度深,意识形态接近,更希望“搭便车”,充分利用一段时期内的霸权稳定,维护各自的安全利益,只是在美国做得过头时出来“谏诤”一番。东中欧、中亚、中东等地的大多数国家,或对西方有所求,或怕“枪打出头鸟”,也不构成对美国霸权的重要挑战。关键在于美国拥有的不仅是力量的霸权,它还掌握着制度霸权和话语霸权。

当然,同任何历史上的霸权一样,美国也逃脱不了盛极必衰的命运,只是其衰落的时间、过程和方式难以预料。这一点,布热津斯基等许多美国战略家也看到了。他们想做的,不过是推迟美国衰落的时间,延缓其过程,充分利用这段时期建立有利于美国的国际制度安排。

由此我们也应当看到,缺乏制度保障的安全是不可靠的安全。任何国家、集体和个人,无论自身多么强大,都不能单独地解决安全问题。因此,增强国力只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要推进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制度安排,首先是推出亚太地区安全体系的设想,这才是未雨绸缪。

## 第二,发展——但不够平衡。

美国为何要维系外部世界的和平?最重要的动因,是现时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较为稳定的世界政治环境。制造和出售军火的那部分西方公司财团也许能借局部冲突和军备竞赛发财,但绝大部分国际资本是要向政治安定、市场秩序比较规范的地区和国家流动的,而决不会流向自我封闭、激

烈反西方、动乱危险大的国家和地区。同时,以大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势力,也要在发展中国家主动营造有利于它们的政治环境,培养为它们服务的亲西方、亲资本的社会精英。西方政府同这些国际资本势力的利益和目标是一致的。

冷战的结束加速了世界发展中的两大失衡现象,即东西(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以及南北(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失衡。近一两年来,美国、日本和法国等欧洲国家政治向右转,表现了大资本势力在这些国家的影响扩大。近年来右翼势力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上升十分明显,其背后也有国际资本的支撑。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外部世界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资本治下的发展”。所谓经济全球化,核心是国际资本向投资环境较好的地区流动。

这种“国际资本治下的发展”,加剧了发展中的多种不平衡现象:南北差距、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美国同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都在拉大;发达国家内部贫富悬殊;发展中国家内部地区差异加剧、两极分化严重;全球生态平衡遭到惊人破坏。

在发达国家里,美国继续集巨额资本、优秀人才、先进技术于一身,以创新精神推动生产力蓬勃发展,成为国际资本扩张的火车头。欧洲和日本的发展速度迟缓,创新精神不足,但社会相对平衡稳定。发达国家集中了资金和技术,将发展中国家“发展”成它们的海外市场和下游产品的加工厂。这种趋势将继续激化各种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当我们欢迎资本的时候,切不可忘记,资本扩张本身是不顾及平衡的,往往是以牺牲除 GDP 以外的其他社会发展指标为代价的。资本追求的是效率而不是公平。维护社会公正和公平,主要是政府的责任。西方国家经历了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上半叶的全球性战乱和暴力革命,又经历了冷战时期同社会主义的斗争,政治制度、市场规则和法律制度日臻完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比较协调,政府同企业在组织和功能上都是脱离的,由资本扩张所导致的国内发展不均衡由政府管制在可控范围之内。更兼有自由派的批评和“第三条道路”等呼声,不致出现政治上翻车的危险。

毋庸讳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冷战后开始“转轨”的国家,其政治、经济、法律制度远未完善,由于发展不平衡而导致动乱的危险始终存在。如果亲西方、亲资本的倾向继续发展,作为社会平衡器的政府功能又不能同作为经济发动机的企业功能分开,政府同社会的关系就会进一步疏离和对立。资本的扩张和政府的腐败彼此结合,其国内后果和国际后果将会十分严重。在这方面,印尼、阿根廷等国家的教训必须记取,而欧洲经验比美国经验更加值得借鉴。

当前世界上的局部战乱和发展失衡都主要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战乱和社会动乱造成发展的停滞和失衡,而发展失衡又成为战乱和恐怖主义的根源,其中还有西方大国的干涉插手。各国反全球化运动的表面形式各异,在发达国家有排外的民族主义,在发展中国家有激烈的反美倾向,而它们的根源似乎有某种相通之处,即资本畸形地过度扩张所造成的严重社会不公和生态失衡,激起了普遍的愤懑和对前景的忧虑。

### 第三,价值观与制度的重建。

现时代的政治特征,还包括意识形态和宗教方面的变化。无论是和平还是发展,都不能取代人们对社会公正和精神信仰的追求。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变革的进程,正在冲击着人们长期形成的地方属性、家族属性和国家属性,迫使个人和群体在新的环境下寻找新的自我。当两大意识形态的斗争不再成为全球思想纷争的主线之后,民族文化和宗教文明就走上了前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分别只有一百到两百多年的历史,而主要的民族文化以及基督教、犹太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等,都有着几千年到几千年的历史,而且在所有主要的文化和宗教中,都出现了回归传统的所谓“原教旨主义”倾向。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尽管有其偏颇之处,但其推理过程和所举论据(如“冷战后伊斯兰世界的边界上到处流淌着鲜血”)却发人深思。

在美国,多年形成的以文化多元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正确性”,在“9·11”的冲击下向以国家忠诚为核心的“政治正确性”转移,“瓦斯普”(WASP,即白人

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新教)文化的主流地位是否会重新受到强调,尚待观察。在欧洲,随着部分经济和政治主权向欧盟的让渡,民族国家的意识逐渐为共同的欧洲意识所补充,其深处是悠久的共同历史和文化积淀。在中东和许多有穆斯林聚居的国家,伊斯兰信仰的凝聚力不容任何人忽视。在东亚,前些年提倡的“亚洲价值”虽然不再被经常提起,但类似2002年足球世界杯那样的活动,呼唤起人们对“我们东亚”、“我们亚洲”意识的热情,这在20年以前是无法想像的。凡此种种,都说明文化属性、地域属性和价值观的重建是全球范围内同时发生的现象。

价值观的重建伴随着制度和发展模式的重建。特别是前苏联东欧地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的制度探索任重而道远。“穆斯林国家能否建立现代民主制度”这一老问题仍然难以找到答案。相对而言,西方国家的制度调整比较简单,无非还是围绕着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展开。主要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由西方意识形态和制度主导,是显而易见的。此外,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在各国社会和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也是当今世界政治的特征之一。

最后想针对“后后冷战时代”的提法谈点看法。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9·11”之后不久提出,世界已经进入了“后后冷战时代”。现在看来,这一说法的内涵,不外乎指美国找到了“恐怖主义”这一主要威胁,为此形成了多国合作的局面,大国对抗的时代于是正式结束。

“9·11”对美国的撞击确实是意义深远的。它改变了美国对安全威胁来源的看法,使美国调整了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它打破了美国国内安全不受致命威胁的神话,影响了美国国内政治议程,使美国将大量国家资源投入内部治安;它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平衡,使以布什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巩固了阵地,压制了自由派在国防和外交问题上的发言权;它突出了政府的功能,加强了美国人的国家观念和民族主义,使一些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合理化。

但是,“9·11”是否有冷战结束那样一种划时代的影响,现在还难以断定。“9·11”毕竟是一个局部

事件,仅仅是因为美国的强烈反应而搅动了世界,引起了其他地区的反应和调整。它只改变了美国国内议程的轻重缓急,而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将反恐列为国内中心任务。迄今为止,“9·11”悲剧没有出续集,布什政府有利用和夸大外部威胁以达到国内政治目的之嫌。即使是在美国,除华盛顿、纽约、洛杉矶等少数城市以外,人们也很少感受到什么“战时状态”。本·拉丹及“基地”组织是否有美国所称的那种能量和图谋,不得而知,但美国利用反恐来扩展势力范

围,则是世人皆知的事实。同冷战时期的“主义”不同的是,“恐怖主义”既不是一项政治主张,也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它缺乏固定的组织和领导,更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公开支持。“反恐新战争”作为美国的中心任务究竟能持续多久,连美国人自己也说不清楚。因此,把“9·11”作为一个时代的开端,目前似乎更多地反映着部分美国人的感受,是否具有全局意义,尚待时间来检验。○

## 格局·潮流·时代特征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考虑和界定时代特征需要一个范式或大框架。它首先由我们的视野来决定,这个视野在空间上主要应当是全球和跨国体系意义上的“世界”,特别是包括国家政治经济、国际政治经济和跨国政治经济在内的世界政治经济,或者说是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所用的最大常用概念——“世界政治”;它在时间上,则是“时代”,亦即一整个有本身比较独特的基本技术和文化环境、基本构造、基本方向的较长历史时期。将一个时代的世界政治在时空两方面的最本质要素抽象出来,就有了一个类似于坐标的东西,每个国际行为体都可以在此坐标的平面上找到自己现今所处的一个复合性位置,而这个坐标的两轴,便是世界基本格局与世界基本潮流。

世界基本格局主要指国家间力量和权势的基本分布状态。这方面 20 余年来尤为突出的大致是这么一个事实:美国及其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共同体在总的力量、权势和大部分功能领域(即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技术、财政、思想文化影响和国际规则体系等)占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冷战结束以来的 10 余年内,美国的优势更是多半由于下列四大事态得到了新的巨大增长:苏联瓦解、美国成功发动和展开信息技术革命、大力进行“新军事革命”以及美国经济在 90 年代的大调整和大发展。不仅如此,“9·11 事

件”以来,美国霸权性优势的支配或严重影响范围几乎可以说出现了进一步的跃进式扩展。这首先是因为在空前剧烈的恐怖袭击的巨大震动和全国性安全恐慌背景下,美利坚民族行使优势和为此承担代价的意愿大为增长,美国公众对一个怀抱“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念和强烈民族主义、霸权主义情绪的政府给予了近乎“空白支票”式的支持。在这些情况下,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清楚的是,未来很长时间内将没有可能形成如此经久、如此有力、如此团结的国际阵线,以致能在世界政治总体和大多数头等重要的领域真正制衡美国的过大权势。特别是在仍然对世界政治至关重要的军事领域,国际体系内超级强国同其他大国之间力量的失衡(甚至一般还有意志的失衡),可以说达到了至少 500 年来首屈一指的地步,因而也最难造就真正的均势局面。

当代世界的基本潮流大体上分成往往互相交错的四个时代趋势。一是往往被人较片面地局限在经济领域来谈论的全球化。就其全面含义而言,全球化可以说主要由四大事态来标志:(1) 国际/跨国交往愈益广泛、稠密;(2) 全球国际体系中非国家行为体迅速增多,其作用显著增大;(3) 民族国家及其主权日益被侵蚀和被削弱;(4) 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之间的传统区分渐趋模糊和局部丧失。这样的全球化